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冯天瑜 陈锋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冯天瑜 陈锋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 冯天瑜、陈锋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 - 7 - 5004 - 9101 - 9

I. ①张… II. ①冯…②陈… III. ①张之洞(1837~1909)—人物研究—文集—②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①K827 = 52 ②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185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0.75

插 页 2

字 数 688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今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张之洞逝世 100 周年，也是张之洞总督湖广、大规模展开洋务建设 120 周年，由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汉大学有关研究机构联合主办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氏 1893 年创办的方言学堂之后身武汉大学召开，海内外学者汇聚一堂，就张之洞的功业及思想，就中国近代化进程与经验教训展开讨论。本集为此次研讨会的论文选编。

一度担当中国生产方式近代化转变的主持者的洋务大吏，是一批新旧杂糅、充满矛盾的过渡型人物。其代表，朝廷内是恭亲王奕訢、内阁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操持实务的封疆大员主要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刘坤一、丁宝楨等人，张之洞（1837—1909）是后来者。曾、左、李等人兴办近代工业，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初，而张之洞则在 80 年代初期方从清流党转化并跻身洋务派行列。然而，这位洋务活动的迟到者却后来居上。人们一般以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但张之洞的洋务事业恰恰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初年进入高潮，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布纱丝麻四局等军民用机器工业的兴建，新军的编练、新式学堂的开办、游学生的派遣等耸动中外的实绩，都成就于这一时期。

在张之洞的全部洋务活动中，实业建设是重要的部分。他所主持兴建的京汉铁路是中国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铁路干线，汉阳铁厂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湖北兵工厂是清末民初最大的军械工厂，布纱丝麻四局是华中最大的纺织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张氏看作中国近代工业，尤其是近代重工业的奠基人。毛泽东在谈到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时，曾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

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这里所说的“不能忘记”，可以理解为不能忘记他们为中国近代工业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和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张之洞洋务建设的另一贡献，是对近代新教育的推动。

19世纪80年代出任封疆以后，张之洞便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他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有鉴于此，张氏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科举”、“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四项建议。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即留意于物色主持新式教育的人才，引时务入教育，改变科举制义的老套。经张之洞惨淡经营，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湖北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一大中心（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图书馆的源头都要追溯到张之洞的文教创举），张之洞在朝野赢得了“通晓学务”的声誉。张之洞成为清末新教育“确立期”的代表人物。

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钦定学堂章程》，提出我国第一个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学制。这个学制虽参考了“欧美日本各邦成法”，其实多半取法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清廷派蒙古旗人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荣庆与张百熙政见不和，欲推倒《钦定学堂章程》。恰在此时，张之洞入京，因他“负海内重望”，“尤抱整饬学务之素志”（刘禹生：《世载堂杂记·张之洞遗事》），故张百熙奏请张之洞参加修订学堂章程。朝廷同意加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二位管学大臣重订学堂章程，该年十一月重行颁布，这便是《奏定学堂章程》。清末新教育便根据这一章程在全国实施。因该年为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经政府正式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

此外，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光绪二十九年在制订新学制的同时，张之洞又与张百熙、荣庆一起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与盛京将军赵尔巽等会奏，废止科举，广办学校。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颁布“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上谕。“于是沿袭千余年之科举制度，根本划除。嗣后学校日渐推广，学术思想因之变迁，此其大关键也。”（《清史稿》卷一百七，志八十二，选举二）张之洞在其间发挥重要作用。

张之洞还是清末军制改革的重要开创者。他组建“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其主观动机当然是为着拱卫清朝，所谓“执干戈以卫社稷”，但客观上新军成为革命的温床，革命党人成功地实现了“抬营主义”，辛亥武昌首义实为一次革命党人发动的新军起义。从张之洞言之，其兴实业、练新军、办文教等现代化事业，动机与效果二律背反。

张之洞不仅是一位洋务活动的实行家，他还力图自立学说，企求建立应对时变的理论体系。张氏在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以比较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日“流行语”。1901年，由张之洞主笔，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衔会奏的“江楚二督变法三疏”，成为清末新政的纲领，张之洞本人则是“新政”的主持者。

总论之，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张之洞都可以看作洋务运动的终结性人物。历史也确实是通过张之洞给洋务运动打上句号的：在张氏惨淡经营洋务近20年的湖北，于张氏辞世后两年，便爆发了推翻清王朝及两千余年专制帝制的辛亥武昌起义。

武昌城爆发的首义枪声，宣告清王朝和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终结。人们不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颇与张之洞相关：

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页）

说这番话的张继煦，曾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对恩师多有理解的同情和衷心的赞扬，其“种豆得瓜”之论，颇为传神。

孙中山1912年4月在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造访首义之区武汉时，曾对南皮张之洞的业绩发表这样的感慨：

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4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孙先生此议，确乎是对张之洞开辟的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意义作了画龙点睛的评断，诚为不刊之论。

冯天瑜

2009年11月24日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序言	冯天瑜(1)
忠臣·学者·改革家	
——在“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赵德馨(1)
近代化方略之辩	
——《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评析	冯天瑜(13)
从一首“传家诗”看张之洞的政治和教育思想兼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涵义	张厚玖(28)
张之洞研究百年大事记	王玉良(39)
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	
——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	孔祥吉(56)
为张之洞释梦	
——兼答李细珠诸先生	孔祥吉(82)
张之洞的日本政法顾问松平康国(天行)	邓 红(96)
试论张之洞督粤施政的地方主义倾向	方 芑 邓正兵(111)
张之洞督鄂与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改革	方秋梅(132)
张之洞的联日制俄政策与日本	[日]伊原泽周(144)
张之洞与光绪初年官兵滥杀东乡县寨民事件	张建民(161)
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的几个问题	张遵遼 张厚琬(180)
甲午以后张之洞政治地位的飙升	吴剑杰(197)
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	
——与孔祥吉先生商榷	李细珠(211)
张之洞与湖北新军身体之规训	李 翔(243)

2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张之洞的外交思想	陈 钧(255)
论张之洞与清末湖南对外交涉	王佩良 饶怀民(275)
张之洞与广东海防近代化	萧致治(291)
张之洞对驻防八旗及满汉关系问题的思考与处理	潘洪钢(307)
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的商品赛会	马 敏(329)
张之洞与江南制造局的迁建风波	刘 薇(336)
论近代湖北织布局的经营危机	任贤兵(350)
论张之洞的理财思想	张 宁(366)
“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涂文学(381)
论张之洞的版权意识	
——从主张“广译”到参与中日版权谈判	郝祥满(396)
张之洞与晚清漕运	倪玉平(411)
张之洞与晚清汉江农业	徐凯希 张博峰(420)
张之洞与清季社会经济发展	谢 放(433)
张之洞兴办湖北洋务企业历史作用探析	谭晓曙(458)
张之洞在武汉的兴教新政	皮明庥(465)
《经解入门》抄袭张之洞著作条辨	司马朝军(480)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徐建寅《器象显真》对中国近代工程图学的贡献	刘克明(508)
张之洞与西方社会科学在武汉的初期传播	张笃勤(522)
简析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	张艳国(548)
汉版《张之洞全集》读后	严昌洪(567)
为何独缺联语?	
——编纂《张之洞全集》札记之一	赵德馨(574)
八州遍到拜公祠	
——张之洞的苏东坡情结刍议	秦进才(578)
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	彭雷霆(588)
张之洞少年著作《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介绍	何长凤(601)
武汉市档案馆发现一批梁鼎芬书札档案	吴 敏 宋晓丹(615)
张之洞传	冯天瑜(626)
后记	陈 锋(643)

忠臣·学者·改革家

——在“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赵德馨

百年褒贬无定论

张之洞去世已百年，对他的评价仍是褒贬相伴，誉毁交加，尚无定论。对此，《张之洞》大传的著者马东玉作过如下的描述：“从张之洞办企业、办学堂开始，在当时，在后世，中国人、外国人，评论者不绝于言论，不绝于笔章。仅就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和教育思想而论，批‘旧学’者斥其封建、顽固，批‘西学’者骂其买办、卖国。说他有功者有之，咒其有罪者更多，真是笔口喙置，不一而足；人虽盖棺，其论难定。”^① 这种概括符合实际情况。值得补充的是，在清末人物中，张之洞大概还是争议最多的一个。

其所以这样，据我的分析，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评价的主体不同，他们的需求不同。二是评价的时期不同，历史的主题不同。由于这些原因，以致同一时期不同主体的评价不同，同一主体在不同时期的评价截然相反。^② 对张之洞评价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评价主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政界（包括政府和政界人物，以

① 马东玉：《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

② 还有一些次要原因，如评价主体所在地区不同等等。张之洞去世时，南皮与天津，天津与武汉，舆论评价显著不同。此中有地缘因素，有利益关系因素，也有地方官员观点的因素。

及被他们操纵、控制的舆论)。第二类是学界。第三类是群众。

群众的评价是自发的,也比较稳定。看群众的评价,主要看张之洞任职地区,即北京、四川、山西、两广、两湖、两江老百姓的反映。他任学政六年,督抚二十五年,在地方上当官总共32年。其中时间最长的要数湖北,在武汉达20年(任湖北学政三年,湖广总督十七年)。所以看群众的评价,既要看京、川、晋、两广、两江的,更要看湖北的,首先是武汉的。张之洞主持修成汉口的长堤后,堤下住户把该堤称为张公堤,一些农民在家中设张之洞牌位,逢年过节焚香祭祀。武昌西湖闹匪患,张之洞派兵弹压,居民得以安宁,该地群众把自己住的地方改称张公寨,近年又立雕像纪念之。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湖北省学界筹款建奥略楼,以表怀念之情。1909年,张之洞去世,湖北省军界中张的学生建抱冰堂,以纪念他。20世纪80年代,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下设张之洞研究会,以研究他。近年,华中农业大学一个班的同学将自己的班级命名为张之洞班,以示对他的尊敬。如此等等,皆群众自发之行为。武汉大学尹进教授生前在一次讨论张之洞评价的学术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中,他奉命发动工农参与批判张之洞,到汉口张公堤走访贫下中农,被访者说:过去,这一带的一些农民在家中神龛里设神位祭祀他,向他叩头跪拜,有的神龛现在还在;没有他修堤,我们没有这里的田可以耕种,批他干什么!又到武昌访问张之洞办的纱厂、布厂的老工人,被访者说,他办了工厂,使许多人有事做,批他做什么!这样,发动工农群众批张之洞的事一直没有搞起来^①。

关于政界的评价,先说清朝廷。清朝廷认为他是功臣,予以重用和奖赏。远的不说,只说张之洞生前的最后十年。1901年授予他太子少保銜。1906年晋大学士,旋充体仁阁大学士,又授军机大臣兼监管学部大臣。1908年,兼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授太子太保銜。1909年,又任修德宗实录总裁官。张之洞病重,上谕中谓其“公忠体国,夙著勤劳”。监国摄政王载沣亲临寓所看望,又当面誉其“公忠体国”。他去世后,在谕祭文中称他“学问博通,经济宏远,持公廉政,体国公忠。……文章独出于词林,奏议尽关于实务。武昌作镇,江表宣勤,大局危而恃以安,国是纷而

^① 我没有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造反派纳入“群众”之中,他们在南皮掘张之洞墓,暴其尸;在武汉将张之洞路改为紫阳路。

资以定”。又谥文襄公，评价很高。

清朝廷的对立面是反清志士，如自立军和同盟会成员等等。他们奋不顾身要推翻清朝廷。张之洞作为清朝廷的大臣，则竭力维护它的统治。二者势不两立，处于敌对位置。张之洞残暴地镇压反清志士，对唐才常予以杀害，把孙文等人的名字加个“彡”旁。这些革命者则认为张之洞是刽子手、罪人，理所当然地把他妖魔化。翻开1903年至1905年期间革命党人在日本办的刊物上，张之洞是一个附鳞攀翼的汉奸形象。1906年，革命党人发动萍浏醴起义，张之洞派湖广新军第八镇第二十九、三十二标等部前往剿办。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张之洞派张彪率两营、二炮队以及兵轮二艘去安庆弹压。张之洞的这些行为受到革命党人的强烈谴责。1907年出版的《汉帜》第一号所刊《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一文写道：“杀汉奸必杀张之洞。庚子之汉变之屠戮，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之洞之残汉媚胡，可谓不遗余力。……盖之洞者，满族之功臣，而杀同胞之上手也。吾辈不杀此老贼，终无以寒汉奸界之胆耳。”革命党人所作漫画，将张之洞的头置于胯下，侮辱之，以宣泄其愤恨。

辛亥革命以后，上述两种政治势力对张之洞的评价发生颠倒性变化。代表清朝廷观点的逊清遗老，转而指责张之洞为亡清的罪人。恽毓鼎认为，清王朝是因为派东洋留学生、编练新军、推行立宪等新政改革而灭亡的，“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王先谦说：“张南皮主办学堂、新军二事，遂为乱天下之具。”刘体仁称：“文襄练兵廿载，至是成为戎首。”

辛亥革命之后，清朝廷已被推翻，张之洞已经去世。革命党人在回顾和总结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想到了张之洞，转而赞扬他。1912年4月，孙中山到武汉，在游览纪念张之洞的奥略楼时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后来孙中山和日本友人讨论建都时，提出设“一京四都”，“一京”即指武昌。孙中山这么看重武昌，是对张之洞经营武汉十多年，使之现代化和地位提高的肯定。张继熙认为，张之洞在湖北的活动，使湖北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辛亥革命能成大功。此虽为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国民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执政后，把武昌的一条街命名为张之洞路，把汉口的一条街命名为南皮路，又在汉口的中山公园修建张公亭以纪念张之洞。这些均是政府行为。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前，其成员作论，多贬洋务运动，将张之洞称为反动派。执政后，面临工业化任务，想起了为中国工业化做过贡献的先驱，对张之洞的评价就变了。毛泽东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任务，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于是又从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角度审视张之洞。湖北省的领导人说张之洞是湖北现代化的奠基者。武汉市的领导人称赞张之洞在武汉所办事业是“用世界眼光谋划发展的壮举，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湖北，多处设他的雕像，出版了他的全集，召开过多次以张之洞为主题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并建立一个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

在学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给张之洞以不同的评价，真可谓人言言殊，百家争鸣。大体来说，国外的“旁观者清”；国内的独立学者明，受阶级斗争学说支配者贬，取现代化和改革开放视角者褒。他们加在张之洞身上的衔头形形色色：从反动官僚，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买办，刽子手，到洋务运动后期的主帅，新政的旗手，再到思想家，学者，实业家，教育家，儒臣，清官，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奠基人，新军制的拟订者，司法、监狱、警察制度的改革者，湖北现代化的奠基者，近代武汉之父，现代武汉的缔造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张之洞是一个多面孔的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给他定位。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从张之洞这个人的主流而言（不是全面的），他的主要身份应该是：忠臣、学者、改革家。

清朝廷的忠臣

张之洞是清政府的重臣，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即被视为“朝廷柱石”，后又参与枢密。从张之洞一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来看，他用“持危扶颠之心”，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圭臬。他所作所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巩固清朝廷的统治地位。他的一生忠于清朝。忠臣是他的第一身份。

所谓忠臣，是谋事为国不为私的人。在清代后期的特定环境下，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上，为国谋利，而不是为私谋利，也就是当清官，不做贪官。第二，在军事上，为国练军，而不是为私练军，也就是把自己练的军队视为国有，不是当作私产。第三，在人事上，为国

造才、用才，而不是为己造才、用才，也就是把所造之才为国行政，不是作为自己的党羽，结党营私。

张之洞在经济上是清廉的。百余年来，对张之洞的评价各种各样，说他清廉却是众口一词。晚清的世道，正如张之洞在《遗折》中向皇帝呈述的：“方今世道陵夷，人心放姿，奔竞贿赂，相习成风。”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坚守清廉，对清朝廷来说，是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事。第一，他用自己的清廉带动了所主持的政权机构及官吏的清廉。对此，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有过具体的记载和与盛宣怀衙门生动的对比。^①第二，这种清廉带来政权机构的节约。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任上，即减总督府经费 2000 两。为官者清廉，政府机构节约，这两条便为清政府树立了一个好的形象。这是清朝廷为执政合法化和巩固统治求之不得的。

张之洞为办企业、教育等事业，设过新捐税项目，也在旧捐税项目上增加过金额，使湖北财政收入大增。对此，讥之者称为“屠财”^②，他临终前建议皇帝“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实际上，这也是他“膺疆寄几三十年”的理财原则。他主要是通过培育工商业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增加工商业税捐收入来解决财政困难。他将所得收入用于公而不入私囊。更有甚者，他还将个人的合法收入捐给教育、慈善事业。一个在张之洞治区生活了十几年，对张之洞政绩有过近距离观察，并与之有过直接接触的英国传教士写道：“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③张之洞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④。据辜鸿铭记载：“他任两广和湖广总督期间，用公款引进了外国方法，同时慷慨捐献了几乎全部私人财产，用以创立高等院校，以便加强儒家学说的学习。”^⑤张之洞用自己的所得，不仅给高等学堂捐献，也创办南皮慈恩学堂和向多

① 见《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理财》。

② 张之洞在湖北举办新政，规模宏大，为筹集巨额经费，他整顿税收，铸造银元、铜元，发行纸币，开辟财源。人称“庚子以后，湖北筹款之多，甲于天下”。有人将张之洞的这种行为称为“屠财”，将岑春煊弹劾大批官员称为“屠官”，将袁世凯杀人多称为“屠民”，他们被称为清末督抚中的“三屠”。

③ 《英传教士对张之洞的印象》，《武汉春秋》1987 年第 3 期。

④ 《大清畿辅先哲传·张之洞传》。

⑤ 辜鸿铭著，语桥译：《清流传》，凤凰出版社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 页。

所小学捐款。清廉，这是忠臣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有利于他做学者和改革家。

不谋私利在军事上的表现是军队不私有。从咸同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组织团练时起，编练军队者都将所练之军视为己产，于是有“湘军”、“淮军”。与张之洞同时练新军的袁世凯也与曾、李一样，北洋军成了他手中夺取权利的工具。张之洞重视编练军队，但他却没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那样，把所编练的军队看成是私有财产。1895年，他在署两江总督任上编练了自强军。1896年回湖广总督任时，将这支军队交给返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随后，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其质量与势力在南方地区居首位。1903年，他把该军洋操队八营调到广西去，交给岑春煊。同年末，为加强京师防务，他又把湖北新军一协调给了直隶。1907年，他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彻底地交出对所练军队的指挥权。在清代后期练军诸人中，像张之洞这样处理的，未见第二人。

不谋私利在人事关系上（实为政治上）的表现是造才不为己用，用人不结党派。清朝从立国时起，王子大臣各树党援。主持学政与考试者，通过师生关系，建立门派。至太平天国之后，政坛上更有湘、淮等派系。张之洞两任考官，两任学政，简授山西巡抚，总督两广、湖广，再权两江，近30年里，门生故吏众多，培养重用不少的人，然不与之结党，故世无“张（之洞）系”。张之洞去世时，他在《遗折》中以此自豪：“臣平生不树党援，不殖生产自励。”据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二记载，张之洞去世的前一天，朝廷已拟定特谥“文忠”或“文正”，但因他的这种表白，触及亲贵之忌，改谥“文襄”。（清谥制，公以成、正、忠、襄为序；文襄授予武功卓著者。张之洞以文治著称，未临前线带兵，少有武功。）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做一个不树党援的人是多么的稀少，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张之洞一生以做清朝廷的忠臣为奋斗目标，这与他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张之洞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四代人中，都是府县官员，都以清朝忠臣自居。张之洞所受家庭教育以“忠君”为基本出发点。张之洞的老师也都向他宣传“忠君”的思想。张之洞的文章，从十一二岁的课业到临终的《遗折》，从论著到诗词，从公牍到家书，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就是一个“忠”字。《劝学篇》内编分为九篇，首为“同心”，次即“教忠”。《同心篇》中提出救今日之世变的三大目标：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这三者关系的先后顺序是：保华种必先保圣教，保圣教必

先保国家，保国家成为救世的首要前提。他阐述的保国思想是为了反驳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国”指的是包括中国版图内全体人民的共同体。在梁启超的著作中，“国”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中全体人民的集合体。张之洞则把“中国”完全等同于清王朝，他要保的“国”，其具体内涵是清王朝。保国，就是保清朝。

张之洞是清政府的忠臣，是清政府的一部分。对他的评价，与清政府分不开。在对外关系上，当俄国侵略新疆，欲将伊犁等地划归俄国时，张之洞反对。这时，他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也就是维护中国的利益。当大清国与法国交战时，这场战争便是中法战争。当大清国与日本交战时，这场战争便是中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张之洞主战并积极行动，这是反抗外国对大清国的侵略，也就是反抗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从他的这些行为而言，说张之洞是个爱国者，理所当然。在对内关系上，当时的清政府，在其历史地位与作用上，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具有反动性。当时的孙中山等革命者是进步势力。张之洞忠于清王朝，站到革命者的对立面，血腥镇压反清志士，阻碍了中国政治的进步。从他的这些行为而言，说张之洞是个反动派，合乎逻辑。

对于张之洞是不是忠臣，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张之洞想当皇帝，这是清朝廷忠臣不应有的想法。对这个问题，可以根据史料作进一步研究。但从张之洞整体思想来看，可能性极小。还有人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倡导东南互保，这是对慈禧“犯颜抗命”，是清朝廷忠臣不应有的行为。1901年，慈禧因张之洞倡导“东南互保”而赏予太子少保衔一事，便足以说明事实不是这样的。

经世致用的学者

与一般晚清忠臣比较，张之洞的特点是以学识尽忠，他是一位学者型忠臣。

要成为学者型官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真知灼见的纯学术论著。第二，能将仕途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学理化。第三，有学者的素质与风范。这三个条件也是学者型官员的三个标志。它们是张之洞所具备的。

在张之洞的众多作品中，有《读经札记》二卷，《论金石札》二卷。它们是纯学术著作。在《读经札记》以及其他著作、书信中，张之洞对公

羊、谷梁，对汉学、宋学，表述了他的独立见解。在清代后期，注重学术的大臣为数不少，其中成就突出的有两个人：曾国藩和张之洞。他们是清代后期 50 多年间两大经学家。张之洞学宗汉学，恪守古文经学立场，反对今文经学，驳斥公羊，却不排斥宋学。他是汉宋兼采，新旧杂糅。曾国藩也主张汉宋兼采，但与张的见地不尽相同并曾以宋学为本，而张是以汉学为本。

关于张之洞将工作中遇到的事情学理化，这里可以举两个例证。

例一，1873—1875 年任四川学政时，针对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作《辘轩语》与《书目答问》。前者分列“语行”（为士之道）、“语学”（为学之道），“语文”（为文之道），教士人怎样修德、治学、作文。后者回答士子“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问题。这两本书因切中时弊，且操作性强，有多种刻本，流传甚广，影响甚大，至今仍有意义。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早期藏书即是依据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及其《补正》所载的经、诗、子、集书目分类收集的。

例二，1898 年，在康有为、梁启超学说盛行，维新变法运动迅猛推进之际，为了驳斥康、梁的政治理论，与之划清界限，预为自保，张之洞写《劝学篇》。这里可以将上文提及的曾国藩与张之洞做一对比。二人治学都主张经世致用。他们在当官时都遇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问题：在国门被西方强国撞开之后，中国人在坚持中学的同时，如何对待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是一个使中国人倍感困惑的重大实际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二人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师”的广度与深度上，张比曾走得更远。在实践上，曾限于器用层面，张则进入制度层次。此其一。其二，曾限于政策层面，张则进入理论层次。张著《劝学篇》，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予以系统地阐述，其中心思想是：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既要学习西方，又不能西化。这是对曾国藩活动的年代至张之洞活动的年代，中国被迫对世界开放与改革进程经验教训的理论升华，又为下一步的现代化提出了指导理论。书中，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上，提出“体”与“用”的命题；在“内学”与“外学”、“旧学”与“新学”的关系上提出了“本”与“通”的命题；在器与道的关系上提出了“变”与“常”的命题；在政与学的关系上，提出了“表”与“里”的命题。这就把为官实践中的问题提高到了学术的层次。所以《劝学篇》既是一本讨论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著作，又是一本学术著作。张